

神農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日前,由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考古学会、湖南省博物馆学会主办的“庆祝中国考古百年”湖南省十大考古发现推介活动结果出炉,株洲醴陵窑被评为湖南省十大网络人气考古发现之一。

醴陵窑是指醴陵辖区内现存的自宋以来的各类陶瓷作坊遗址群,以及与窑址相关的窑洞、窑器运输故道、生活设施、古塔庙宇等其他文物古迹的统称,其中,尤以汾山窑及其周边窑址规模最庞大,文化保留最丰富。

其实,汾山不止有规模庞大的古窑址遗存,更是道家所推崇的“三十六洞天”之一,人文渊薮,千年不绝。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校长、党委书记徐峰,从汾山的古窑遗址出发,丈量汾山周边山水,娓娓道来一个以陶瓷遗址名世的小镇,如何在千年的时光淘换下静谧如斯的秘密。

从古窑址到小洞天

汾山,一个千年小镇的源远流长

徐峰

醴陵是闻名中外的“瓷城”。汾山则是醴陵瓷业的发祥地。据《醴陵县志》载,清朝雍正七年(1729),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汾山设厂制瓷。在有关文献里,这似乎是最早的记载。因此,很多人包括专家学者,都从这一年开始计算醴陵制瓷史。这么算来,只有三百年不到的历史。

如果不是一个窑群的出现,这个观点会继续存在。2007年,这里一个山包起火,树木成灰后是一座白花花的山。村里人觉得平常,外面人却“拍案惊奇”:这里生产过瓷器,什么时候?与醴陵瓷业是什么关系?相继赶来的文物专家们考察得出结论: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古窑群,有宋窑、元窑、明窑和清窑,还有与长沙铜官窑同期的唐代陶器碎片,甚至更早的。文字记载和地下遗存证明:这里便是醴陵瓷业的源头。

如果不是一个窑群的出现,这个观点会继续存在。2007年,这里一个山包起火,树木成灰后是一座白花花的山。村里人觉得平常,外面人却“拍案惊奇”:这里生产过瓷器,什么时候?与醴陵瓷业是什么关系?相继赶来的文物专家们考察得出结论: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古窑群,有宋窑、元窑、明窑和清窑,还有与长沙铜官窑同期的唐代陶器碎片,甚至更早的。文字记载和地下遗存证明:这里便是醴陵瓷业的源头。



在获评湖南省十大网络人气考古发现之前,醴陵窑便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古窑谈史

车从醴陵城出发,一路逶迤往汾山。半小时后,转过一个山脚,再驶过一座长着青苔的石板桥,就到了汾山镇汾山村口。只见一座灰白色的砖塔矗立在山道右侧,恰如一尊守护山门的罗汉。如果从塔的位置来看,我相信这是一座古塔。可是外露的水泥皮又让人怀疑其年代。

隔着山道,一个院落盘桓在砖塔的侧对面。从风格来看,这个小院应该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,有些斑驳的黄土墙,嵌着暗褐色的木制门窗,顶上盖着青黑色的瓦片。院外两棵没有吐绿的老树紧贴着墙壁,硬生生让出一条道来。道旁是一湾长满星星点点野花的稻田。这是汾山“醴陵窑”址群中的“月形湾窑区”。

一位六旬开外的瘦削老人来了。他是负责看守这个院落的当地村民。老人打开大门上的锁,让我们进去,并热情地陪同讲解。这是一处保存极为完整的窑厂,传统制瓷所需的采泥洞、水车碾房、洗泥池、沉泥池、作坊、绘画室、做墨用房、釉池、薪柴堆坪等场一应俱全,还有窑主办公房、窑工住房以及祝融官、戏台等。如此完整,让人心生疑问,这是什么时候的窑厂?院内石灰粉刷的墙壁上不时可见那个激情年代的标语,甚至还有生产大队分发农作物的记录,细心看墙上的这些字,还能找到一行“仙源瓷厂”的毛笔字迹。所有这些告诉我们,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里还在生产。可是斜躺在院子中间的一座阶级窑,又传递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信息。老人告诉我,这座窑建于清朝光绪年间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停烧,他的爷爷当年就在这里做技工。清朝,又是清朝。那个广东移民廖仲威在这里办厂后,这里究竟有过多少窑厂?

走出院子,只见四面的丘陵小山到处点缀着粉红的、紫色的杜鹃花,偶尔几声鸟鸣,着实显得山更幽静。高照的艳阳,淡蓝的天空与青山绿水黄土墙,给汾山村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神秘面纱下的汾山隐藏着什么秘密吗?如果不是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,这一秘密还要继续隐藏,世人也不会知道,汾山的制瓷史还要更早。

那年的春夏之交,一位普通农民无意引发的一场山火,把汾山村的一个山包烧个精光,满山的白瓷碎片代替了原来的郁郁葱葱,青山变成了瓷山。这么多的瓷片,前来考察的专家不但从未见过,也从未听过。随着考察的展开,专家们发现整个汾山村就是一个古窑群,而且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古窑群。巨大的窑群一下子填补了历史的真空,汾山变成了汾山窑,而且是千年古窑。

如果注意到汾山村的制瓷原材料,我们对这里燃烧千年的窑火就不会觉得特别奇怪。这里遍地都是质地优良的瓷土,而且多是极易发现和开采的露天矿,加上四周树木茂盛,制瓷的原料异常丰富。如此丰富的资源,自然躲不开历代瓷业者的眼光,出现一座跨越四朝的古窑群并不奇怪。只是,由于元末和明末的两次战乱,土著居民殆尽,宋、元、明的制瓷辉煌才被尘封山林。像月形湾窑区的龙窑,专家考证表明宋代就有了,以后历代的作坊窑厂都只是原址重建一座龙窑而已。战乱和移民,让后人记得的是清朝大移民时的广东人。其实,廖仲威在广东时就是个瓷业人员,职业习惯让他走进汾山后一眼就看到了瓷土。当时的汾山归寺院所有,廖仲威于是赶紧向汾山寺僧租地,并邀来同乡技工设厂制瓷,还尊明代瓷业功臣樊进德为先师,建庙祀之。醴陵又一次开始制瓷。嘉庆年间,形成以汾山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的瓷业产区。汾山,确实是醴陵瓷业的发祥地。

如果从陶瓷史的角度说,应该感谢那场改写醴陵制瓷史的山火。由此,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,千年之中有多少历史尘封山林,有多少迷雾缭绕真相?要还原一个跨越千年的醴陵瓷业,还需要更多的发现。



“古洞天”到仙桥水库的路上,沿途随处可见废弃的瓷器。



灰白色的砖塔矗立在山道右侧,恰如一尊守护山门的罗汉。

洞天礼佛

其实,最早让汾山进入中国文化视野的却是道教。因为,这里有道家推崇的“小洞天”。

从月形湾窑址出发,继续往山里走去,几分钟的车程就到了“古洞天”。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建筑,红墙黛瓦,正门上面题着“古洞天”三个大字。观其座落,背靠蜈蚣岭,左有青龙桥,右是白虎桥,前有小溪水,青山隐隐,树木苍翠,风景殊胜,其地形山峦叠抱中庭,兼采阴阳二气,确实是个神仙修炼的好场所。

从名字来判断,这应该是个道观。因为“洞天”二字就源于道教文化,意思是地上的仙山,即神仙在世间修炼居住之地。唐代道教名人司马承祯著有《天地宫府图》,将当时全国各地适合道家修炼的地方分为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。汾山,位列第十三小洞天,“周回三百里,名曰好生玄上天。在潭州醴陵县,仙人花邱林治之。”我知识浅薄,对这个“花邱林”一无所知,既不知他是何方人氏,有何道行,更不知他有何故事。不过,他的修炼之地竟然能名列“洞天”,想来应该不是等闲之辈吧。

走进“古洞天”,发现这里除了道家神仙,还有西天菩萨。这里是“佛道共存”的,宋代开始,这种现象在全国都差不多。如果去探寻佛、道的教义,还可以发现许多相互借鉴和吸纳的痕迹。比如,观音菩萨本是佛教著名人物,可是也为道教所供奉。其实,道教的观音原本是“慈航真人”。只是唐以后,特别是全真派出现后,提出了“三教合一”的主张,慈航真人慢慢被说成了观音。同样是观音,“千手观音”却是佛教糅合了儒家的“孝”与道家的“神仙”观点而形成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佛、佛、道三者相互争论、相互借鉴、相互补充的演化过程。道家推崇的“古洞天”里供奉佛、道两家人物,也就不奇怪了。

不过,作为历史悠久的“古洞天”,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历史资源挖掘整理好。特别是道家文化,告诉人类顺其自然、师法自然,提倡保护自然环境,实现人与自然的“天人合一”,很符合当代人的生活理念。这种观念,加上汾山村的传统村落原生态风貌,是很能吸引世人的。



月形湾窑区内废弃的窑厂,墙壁上还可看见那个激情年代的标语



“小洞天”是最早让汾山进入中国文化视野的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yzhy83@163.com

水畔寻瓷

临近中午,我们离开“古洞天”,往望仙桥水库赶。沿途随处可见废弃的瓷器,或裸露于路旁,或半掩于泥中,或零散于灌木丛里,或小聚于小土丘上。这些瓷片,虽然默默无言,却以饱经风霜的残缺体态,不时把人拉回历史的某一个时空。

到了水库,无论是水畔岸边,还是附近山包,或是农家的一段矮墙,各种大小的瓷片随处可见。刚一下船,我就在岸边东挖西找,带着一丝兴奋,洗净泥垢,再宝贝一样摆放在船上。很快,同伴们告诉我,“农家乐”的房前屋后更多,而且更好。于是,我兴奋地跑过去,只见有的地方几乎整个山包都是破碎的瓷器,超过人高的灌木,从瓷片的缝隙中倔强地伸展出来。仔细观察,都是民国年间的青花粗瓷,线条着色匀称的年代较远,用图章盖印中间浓两边淡的年代就近了许多。我想找到更为久远的碎片,比如明朝的,或者雍正之前的,哪怕是一个碗底也好。遗憾的是,没有发现。

其实,这种遗憾不仅是我,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。

明朝末年的战乱,让醴陵人口锐减,制瓷业因此中断。清朝初期,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省的五十余县开始大规模向醴陵移民。这些移民成为醴陵人的主体,广东兴宁来的廖仲威就是其中的一员。这个广东瓷工来醴后不忘本行,走进汾山后第一眼就发现了瓷泥,于是和老乡合伙办厂,生产瓷器。汾山窑火,重新点燃。

当年盛迹已不可寻,只留下了这遍地碎瓷片。挖了不少碎瓷片,略一分辨,可以发现无非是些饭碗、菜碗、坛子、罐子之类的寻常日用品。没有精美的器型,也没有缤纷的色彩,都是些粗糙简单的器物,而且没有一件是完整的。这不能怪谁。完整的自然当时就作为产品卖出去了,而要想精美则当时的工艺根本达不到。

自廖仲威之后,醴陵瓷业一直走的是低端路线,皆为粗瓷。粗瓷与细瓷虽仅一字之差,却有云泥之别,质量上细瓷极优于粗瓷,品种上细瓷种类远比粗瓷繁多。正如全国的瓷都景德镇一样,醴陵因为地利之便,也奉景德镇为圭臬。这些瓷坊都以碗、碟为大宗,还有壶、杯、酒盏、调羹、坛、罐、钵、灯台等器物,着色上也较为简单,多以釉下青花为饰。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仿景德镇。如果把醴陵瓷与当时景德镇瓷相比,从称谓上就可以听出高下来。当时,长沙等地的瓷商称醴陵瓷碗为“土瓷”,而景德镇的则为“景德镇”,售价远在“土瓷”之上。从工

艺的角度来说,醴陵的瓷业作坊没有明确的技术分工,从拉坯到绘图都是“一人为之”,仅此一点就与景德镇瓷相去甚远。“土瓷”都是些日常生活用品。对于当时温饱还是个大问题的老百姓来说,这些日用瓷虽然粗糙,但是便宜,足以满足生活之用了。因此,“土瓷”成为醴陵仅次于稻谷的外销紧俏货。

陶瓷的外销,主要靠水运。穿越醴陵全境的绿江河是陶瓷外销的要道,可直下湘江、入洞庭,抵达长江沿岸各埠。绿江河从东乡进入醴陵境后便建有几十处货运码头,尤其在绕城的江段,码头众多,有何家码头、王家码头、邹家码头等,其中姜湾码头最为繁忙,是瓷器转运的主要码头。

我们可以遥想,当年瓷器新鲜出窑后,瓷坊老板们马上组织人手运至姜湾码头,闻讯而来的四方客商则云集采购。偌大的姜湾码头,一下子被装载了各种各样土瓷的手推车、挑担箩筐占满了,忙碌其间的是,光着膀子仍然大汗淋漓的装卸人员。停泊在绿江河畔的大小货船上,则是讨价还价的各路客商。经过一段紧张的谈判和一番繁忙的搬运,满载瓷器的船只扬帆起航,码头才恢复往日的平静。这些船只,将醴陵的土瓷装运出境,销往长沙、湘潭、常德以及湖北的武汉、樊城一带。再由这些地方的码头,销往更远的地方。年复一年的绿江河上,点点白帆,直送醴陵入洞庭;声声号子,尽为斜阳唱余晖……

当中国的新一轮纷乱到来时,醴陵瓷业萧条了,岌岌不可终日。恰在此时,怀揣实业救国梦想的熊希龄注意到了醴陵,并到汾山进行了实地考察。加上之前对日本的考察,他设计了“立学堂、设公司、择地、均利”的瓷业振兴路线图。很快,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先后在绿江河畔成立,不久就开始生产“细瓷”,1908年“釉下五彩瓷”横空出世,1915年获巴拿马金奖,釉下五彩瓷被西方誉为“东方陶瓷艺术高峰”。之后的历史就清晰了,也让醴陵人更感到自豪了,醴陵的“瓷城”之名也深入人心了。

可是,汾山却渐渐退隐了,几乎完全淡出了视野。若不是这些藏在泥土中的碎瓷片,我们几乎忘了这里曾经窑火旺盛。好在文化的血脉是难断裂的,随着醴陵陶瓷产业发展,越来越多人开始挖掘陶瓷文化,汾山不断被世人关注。2013年,“醴陵窑”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2019年,汾山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揭开面纱的汾山,吸引力越来越大了……